

“开明派”研究综述

赵普光, 方久月

摘要: 目前关于“开明派”的研究主要包括“开明派”命名合法性研究、载体研究、开明同人研究和流派内外部关系研究等。现有文献虽为后来者研究“开明派”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但既往研究过分侧重于其合法性,忽视了“开明派”作为文学流派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亦未对相关文学出版实践活动研究给予足够重视。一些研究者由于与“开明派”最初聚集地具有“同乡同城”的关系,便纷纷“抱团”为“本乡本城”进行合法性阐释,暴露出文学流派研究视野狭窄的问题。从文学流派的研究视角对“开明派”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当会为“开明派”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 文学流派;“开明派”;合法性;文学出版;开明同人

作者简介: 赵普光,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方久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中国书话史研究”(10CZW063)。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3.014

“开明派”是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组织形式较为松散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崇尚开明自由、平易近人的处事风格与创作追求,于不经意间聚在一起,开展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文学、文化实践活动,在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上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其代表性人物有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姜建对此文学流派做了系统研究,着力甚勤,影响巨大。自他在2002年^①大量发表了关于“开明派”的研究成果后,“开明派”作为文学史上鲜有介绍的文学流派,逐渐进入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视野,学术界关于“开明派”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关于此研究的论争、分歧也随之而来。笔者对从文学流派角度研究“开明派”的文献进行梳

^① 姜建自2002年在《江苏行政学院报》发表《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后,大量发表关于“开明派”的研究成果,对于其研究的“开明派”成果进行“互文式”佐证,在不同的文章中为“开明派”正名。但姜建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开明派”的研究者,早在1998年,由钱理群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中出现“可称为‘开明’派一支的散文作家队伍”的表述,就已经提出了“开明派”的说法。参见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而“开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第一次被整体地看待需要追溯至1981年,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的前言中提出了“白马湖散文”之说,将其共同具有的清新脱俗的散文风格予以整体性概括,虽然只是对其创作的散文风格进行整体性考察,但已经是站在文学流派研究的角度上了。参见杨牧:《中国近代散文选》,洪范书店,1981年,前言。

理和评述,对以往研究的成就与局限进行客观分析,以期能为“开明派”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合法性研究:关于“开明派”的命名^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文学流派,无论是“语丝派”,还是“论语派”,亦或是“新月诗派”“湖畔诗派”,都因具有鲜明且一致的文学主张而被纳入现代文学经典流派,并以其命名的稳定性而广为人知。与之相较,“开明派”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开明派”在形成之时并无鲜明且一致的文学主张,只是借由办学之名聚集起了一些学者。因此,“开明派”的命名问题备受研究者关注。具体而言,学界关于“开明派”的命名主要有三种:“开明派”、“白马湖作家群”或“白马湖派”、“立达派”。这三种命名方式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合理与不妥之处。

首先,以姜建为代表的研究者,主张“开明派”这一命名,其认为文学流派有组织松散与严格之分,而“开明派”就属于一种组织松散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因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被称为“开明”的文化气质而聚集在一起,但这种聚集在当时却是无意识的,非刻意的。姜建多篇论文梳理了“开明派”的成立缘起与发展变迁,确定了“开明派”同人大部分来自江浙一带的地理坐标,赋予了“开明派”同人江南的文人气质与理想风貌,最终得以为“开明”的涵义找到人文地理学视角和精神层面的双重依托。如姜建在《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中说:

他们中除匡互生是湖南人、刘薰宇是贵州人、朱光潜是安徽人外,其余均为江浙人,即历史上的吴越一带,也大致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同窗、同事、师生等多重关系。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使他们之间很容易产生相似的文化心理和语言习惯,产生一种强大的亲和力。……他们的聚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想追求的相似和文化气质的接近。……这种质朴平易的气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感紧密相连。他们出身于平民,与平民大众有着血脉相通的情感勾连。^[1]

从地域文化模式的影响视角观察“开明派”特点,确乎有很大的合理性。这个视角运用得更突出的则是他的《江南的趣味与智慧——再论“开明派”的精神建构》一文。该文强调“气质论”,即通过介绍江南风物、江南文明发展史得出此地文人受江南文化熏陶的结论。如文中介绍江南文化的柔美动人之处:

这种独特的风韵和质地固然与江南秀丽的山水、崇文的风尚、务实的观念、开通的风气分不开,但更主要的在于江南山水风物与经济政治等多种元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在于江南文化形成过程中人对环境的一种抗争和调适。

^① 按:本文中所有的“开明派”“立达派”“白马湖作家群”皆指同一个文学文化作家集合,只是命名上有所不同。

梳理自太伯奔吴以来的江南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脉络,那就是经济与政治的相反相成。^[2]

这种思路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凸现“开明派”风格形成背后的地域文化因素。但是,地域文化因素只是流派形成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比如,在江南地区形成的其他社团,可能在文化气质上与“开明派”大异其趣,由此可见不能将地域文化视为社团形成的唯一因素。因此,认同并采用“开明派”这一命名,就必须强调“开明派”之所以成为“开明派”,首先,还是在于其设立开明书店这一文学出版机构,及其独具特色、影响广泛的出版实践,以及在出版实践过程中所贯穿和体现出的“开明”精神。

其次,以朱晓江为代表的研究者,倾向于“白马湖作家群”^①或“白马湖文派”这一命名,即以其最初的聚集地作为流派命名的依据,认同并延续1981年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的前言中提出的“白马湖散文”之说,并赋予其起点式意义。持这一命名的研究者多为浙江学者,“开明派”中人也多为浙江籍贯,这种“同乡同城”的地缘联系使这些认同“白马湖”之说的学者一方面为这个文学流派的命名找到了地理坐标,另一方面力争从文学审美方面来说明此命名的合法性。如朱晓江于《“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一文中明确提出将这一作家群命名为“白马湖作家群”,并从作为文学社团的合理性、美学风格的统一性等方面提出“开明派”这一命名的某些矛盾和局限。如文中所言:

他们本身无意组织这样一个文学社团,……他们一直都没有发表集体的纲领性宣言或章程,也没有自己固定的办事机构与明确的机关刊物,更没有需要交纳会费的会员。……叶圣陶的散文中含有大量的时论,态度激越,而丰子恺的散文却更多地带有文化上的反思力;朱自清的“美文”具有华丽精工的美学意蕴,而夏丏尊却以沉郁朴实见长。因此,普通用以概括白马湖作家群散文特征的诸如“冲淡朴实、清丽自然”一类的词语,其实只是一句浑话,盖“清丽”、“朴实”各有所指,根本不能概括这群作家在创作上共同的美学追求与风格特征。

然而,这样一些在创作风格上都颇具个性的作家仍然可以在“白马湖作家群”的名下,以一个相对整体的文学群体来加以考察。^[3]

在朱晓江看来,一方面,有学者将之作为整体的文学社团研究,但“开明派”当事人并没有明确的集结章程和集体性口号,一切都是后来者的追认,这对于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开明派”如若被作为流派来研究,作家个性各异,共性并不突出,个别作家的所谓“清

① 参见朱晓江:《“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第14—24页。朱晓江还在《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及其编辑实践考辨》一文中对“白马湖作家群”作出解释:“本文所谓‘白马湖作家群’,是指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等为代表的散文群体,其重要外围人物又包括俞平伯、匡互生、刘薰宇等人。”参见朱晓江:《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及其编辑实践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98—105页。此处的解释强调了“散文群体”和“外围人物”,无法使得“白马湖”体现出其所负载的有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文化功能或者说是文学象征意义。在流派命名尚未被大众清晰认同之下,笔者认为这样的题注说服力不足。

新风”并不能代表这个名称之下的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朱晓江这样的分析亦有合理的一面,找到了一个文学作家群具有多个名称存在的原因,也为其“起点式”^①的命名——“白马湖作家群”的立论确立依据。当然,仍应该看到,朱晓江的论文亦存在为证明自己命名的合法性而单纯突出一面的问题,对“白马湖”这一地域性名称赋予了过多的延伸性涵义,这不能不说有狭隘化和排斥性之虞。

最后,以景秀明为代表的研究者,依托此文学流派成立初期的办学实践“立达学园”,而将其命名为“立达派”。景秀明《试论“立达”派散文》一文开篇就对“立达派”的特殊性进行了说明:

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立达”散文流派,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有以文学社团、报刊、出版物为主要阵地,有共同的纲领和组织的流派,不过是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创作心态、爱好、情趣大致相同的作家群。这群作家大都来自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围绕在开明书店周围,曾在上海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过书。^[4]

但是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说明此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家群的一群人为何被命名为“立达派”,只是从其粗略的背景介绍中可以看出此派依托于立达学园。张志浩^[5]倒是十分详尽地介绍了立达学园的办学经过,且说明了“立达”这个名称的含义。由此证实,支持“立达派”命名说法的一些研究者是根据立达学园的办学宗旨来为这个作家群命名的。相较于“立达学园”或者“立达派”的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文学研究的数量很少且角度单一,在坚持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进行新的整合研究,未尝不是一条新路。

以上三种命名,虽然各有其合理性,但相较而言,笔者更认同“开明派”这一命名。首先,从开明同人文化、文学活动的观念而言,“开明”是其一以贯之的核心。“开明派”在写作上倡导自由的散文写作,在教育上提倡并实践着民主进步的科学教学——从春晖中学的惺惺相惜到立达学园的艰难办学都离不开同一的开明思想。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笔者更认同姜建的立论。其次,从发展阶段来看,“开明派”的命名恰好对应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的此文学流派发展的繁荣期——开明书店时期。以其最为鼎盛时期的特点为其命名,或许比用“白马湖作家群”命名更具说服力。再次,对应“立达派”说法依托的立达学园,“开明派”依托开明书店出版了一系列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与刊物。就此而言,将之命名为“开明派”要比将之命名为“立达派”更具合理性。而且,更关键的是,研究者理应从文学出版角度来看这个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坛,而且占据了后世文学史一席之地的文学流派,因为开明同人之所以成派而延续,不是因为其在浙江白马湖教过书,也不是因为其创办了立达学园,而是因为他们通过开明书店的出版活动而声名远播和垂范后世。因此,只有当“开明派”作为一个已经具备合法性的文学流派被对待时,才可以更加深入地进行与该流派相关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而非

① 朱晓江在《“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中将“白马湖”作为“开明派”的地标式象征,其第二个标题为“作为文学‘零地标’的白马湖及其象征意义”,在此标题下强调“开明派”在一开始集结之时就已经成为众人的精神支柱、文学中的文学意象、地域上的文明参照物。

不休不止地聚焦于命名争论。

二、载体研究：关于其文学出版实践

笔者虽不完全认同朱晓江“白马湖作家群”这一命名，但较为赞同其对“开明派”的历史演变作出的分期：“酝酿期：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1910年代晚期）；形成期：春晖中学时期（1921—1925）；繁荣期：从‘立达学园’到‘开明书店’（1925—1937）；消退期：抗战爆发以后（1937年以后）”^[3]。需要指出，这个分期中的“消退期”，容易使读者误解。事实上，“消退期”应并非指“开明派”就此销声匿迹这样一个结局性描述，而是指“开明派”迫于战情时局，将其重点出版物《中学生》转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9年，宋云彬等编辑又参与了《中学生》的复刊工作^[6]，“开明派”直到建国后的1952年随着《中学生》的终刊才算消歇。《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出版形式，因战事在1938年一度停刊，是其动荡性经历的体现。姜建^[7]、王晓初^[8]等也认识到了“开明派”阶段性特征的重要性。“开明派”除了酝酿期，每个时期都有“开明派”的文学出版物，按照刊物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是《我们》《春晖》，《立达》《一般》《中学生》《开明少年》^①《开明活页文选》，《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笔者认为，要想完整而系统地研究“开明派”，其所经历过的四个历史分期以及不同时期相对应的主要文学出版物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从历史分期可以较为客观地看出当时历史语境下文坛的生态状况，也可以借由出版现实情况的流变窥探现代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种种变迁；另一方面，倘若整体把握“开明派”，以期对其作出合理史学定位来看，历史分期研究和文学出版物的研究仍不容小觑。目前，有关“开明派”历史演变的分期研究多作为其社团发展的一个时间线索来梳理，进行专门性或针对性的研究少之又少。其中有姜建的《从“我们”到“开明”》^[7]，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开明派”的分期，最终强调“开明派”这一命名的合法性；朱晓江关于“开明派”的历史分期论述见《“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一文，该文指出此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只有充分描述了以上四个阶段的文学—文化活动，作为整体的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文化面貌，才是完整与丰满的；而以往的研究，颇有些割裂于各个阶段、单兵作战的味道。这是令人遗憾的。^[3]

这两者的历史分期叙述都是具有宏观整体研究意义的，只是侧重点和分期的时间细节略有不同。

关于“开明派”文学出版物的研究，经笔者梳理发现，大致涉及教育学和新闻出版。如王梦雅的《从〈一般〉杂志看丰子恺的美育主张与美育理想》^[9]论证丰子恺的“感性启蒙”教育法；燕的《〈大学生〉丛刊受到普遍欢迎》^[10]以纪实新闻的叙述手法介绍了《大学生》丛刊受

① 按：《开明少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前身是《新少年》杂志，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开明少年》。

大学生欢迎的情况,仍然属于教育学研究范畴。同时,《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刊物中的广告吸引了一些研究者,如姚一鸣的《叶圣陶和开明图书广告》梳理了叶圣陶任责任编辑期间,编辑与指导过的开明书店出版物中的广告特点:

开明书店十分重视图书的广告,由责任编辑负责动手为书刊写广告,已渐渐成为开明书店的传统做法,在为图书做广告文字的同时,也传递了大量文化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欣赏理解。^[11]

该文关注叶圣陶作为“编辑名家”的身份,因此这篇文献对于文学出版研究等方面有积极意义。着眼于研究刊物广告的还有欧阳文彬的《读叶氏父子的图书广告》,因作者欧阳文彬曾经在开明书店工作,作为历史亲历者,他对叶氏父子面对工作和读者的诚挚、热忱之心体会得尤为深刻和切实。《读叶氏父子的图书广告》文末曾言:

这些广告对提高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关心和研究新文学运动以及叶老文学、教育、编辑思想的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2]

这就点明了图书广告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其不仅提醒读者朋友在阅读时要留心图书广告,更是提醒研究者在研究文学流派时,不可忽视对文学出版物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以上介绍的相关文献,或是与其他学科有交叉,或是借力于文学出版物而研究作家,但邱雪松的《一切为了青年: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按照时间线索,在介绍《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的曲折办报经历时,大量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梳理出从《中学生》到《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的历史沿革。

著名作家兼编辑欧阳文彬感受到了《中学生》变化:

我很快发现,《中学生》变了,随着时代的浪潮变了。如果说,初期的《中学生》偏重文化学习而兼及思想启发,那么,战时的《中学生》已经把重点从文化学习转到思想政治方面,着重了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宣传。^[13]

邱雪松通过介绍刊物栏目设置的变化,体现了时代变革下《中学生》起到的启蒙和救亡作用。而谭日红的《开明书店与新文学的发展》^[14]则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开明书店成立的来龙去脉及其“读者定位”,却将本应是论述核心与重点的“新文学出版与经典形成”一带而过,只是通过列举一些开明书店出版的名人名家名作,来说明开明书店促进了新文学的发生与传播。这样的说理尚显无力,有失详略之分,当引以为戒。

总体看来,关于“开明派”文学出版的研究就数量和深度而言,仍远远不够。因此,研究者们可通过挖掘梳理原始文献、回溯历史现场、选择新的视角,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开明书店在民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三、成员研究:开明同人

“开明派”文人因其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到了一起,自觉地进行有组织的文学创作和出版活动。研究“开明派”,较为“以小见大”的研究就是从文学流派的角度,通过

研究开明同人的文学出版实践活动来显现其具有独特魅力的开明风。这也是继关于“开明派”命名研究之后的又一研究重点。

“开明派”历经四个历史时期,成员众多,其中关于核心成员的研究是研究的重点。如开明书店的创办者章锡琛,对其的研究主要围绕他以先进的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观念对《妇女生活》杂志所进行的改制史实。一些人迫于当时较为封闭和紧张的社会风气,不敢言说却又想说“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等话题,需要一个言说此类话题的出口或阵地,这便为他创办开明书店提供了机遇。关于他这方面的文学类研究主要有张静等的《出版人章锡琛的妇女解放思想初探》^[15],述及了章锡琛在办刊实践中推行妇女解放观念的若干历程。此外,还有研究者将其与开明书店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如王建辉的《开明创始人章锡琛先生》^[16],霜木的《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17]和章士宋的《章锡琛和开明书店》^[18]。这三篇文章,皆是通过梳理开明书店艰辛的创办过程和战时的非常状态,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章锡琛。其他关于开明同人研究的文献还有叶瑜荪的《丰子恺与开明书店》^[19]和张志浩的《匡互生与立达学园》^[5]。叶瑜荪这篇论文的亮点在于较为集中地统计梳理了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丰子恺的著作,为研究丰子恺以及开明同人与开明书店的“子母”般密不可分的关系提供了帮助。而赵普光等著的《斯文的回响——苏州叶氏家族文化评传》^[20],不仅以传记的形式书写了叶圣陶的文化人生,而且试图挖掘其作为开明同人代表所具有的开明精神。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还有许多研究其他人物的文献,在此不一一列举赘述。关于开明同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当前的研究较多地拘囿于名人名家的研究,过分地突出某一位作家在整个文学实践中的作用,缺少整体性考量。

四、关系研究:内部与外缘

“开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不同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作为独立文学流派与其他文学流派的相互影响和交往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研究内容。陈星等的《从“湖畔”到“江湾”——立达学园、开明书店与白马湖作家群的关系》^[21]可视作此方面的研究。

而朱晓江的《“白马湖作家群”研究若干问题的考辨》则考察了“白马湖作家群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及语丝社等文学社团的关系”,即开展了“开明派”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外部文学社团关系”研究。同时,朱晓江也论及了研究界一直尚未定论的“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问题,其通过假设“宁波分会”是存在的,得到了“这就完全把白马湖作家群看做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分支’了。然而这样的学术意见并不合适。”的结论。文中,朱晓江还论证了学者张堂铸^[22]将白马湖作家群视为“周作人散文流派的一翼”的不妥之处。由此可见,朱晓江研究白马湖作家群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关系实际上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为了反驳将独立的白马湖作家群纳入到任何一支文学流派中去的学术观点,其二是为了白马湖作家群的合法性奔走呼告:“白马湖作家群虽然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文学群体,却也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学群体,有其自身的概念内涵,因而不宜在概念上与别的文学社团混淆在一起。”^[3]

由上可见,关于“开明派”的命名及其合理的文学定位的研究和论争处处可见,这使得原本作为文学流派内部与外缘的关系研究往往被冲淡,真正深入者鲜见。

五、结语

对于“开明派”这个特殊文学流派的研究要有审慎严谨的态度,既不可以拔高其命名研究的重要性,又不可忽视其内在个性与外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关于“开明派”的文学出版实践活动和文学出版物的研究应该进行新的突破,将研究焦点从合法性研究转移至较为薄弱的文学出版研究。如此,方能较为客观和真切地感知开明遗风,为真正有效用和有意义的文学流派研究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 [1] 姜建. 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2, 2 (2): 125-132.
- [2] 姜建. 江南的趣味和智慧——再论“开明派”的精神建构 [J]. 浙江学刊, 2007 (1): 63-67.
- [3] 朱晓江. “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 (6): 14-24.
- [4] 景秀明. 试论“立达”派散文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19 (3): 22-26.
- [5] 张志浩. 匡互生与立达学园 [J]. 鲁迅研究月刊, 2009 (3): 56-58.
- [6] 宋云彬. 认识你的祖国 [J]. 中学生, 1939 年 (复刊号): 12-13.
- [7] 姜建. 从“我们”到“开明” [J]. 浙江学刊, 2003 (4): 91-97.
- [8] 王晓初. “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与流衍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5 (1): 11-13.
- [9] 王梦雅. 从《一般》杂志看丰子恺的美育主张与美育理想 [J]. 嘉兴学院学报, 2016, 28 (4): 40-45.
- [10] 燕. 《大学生》丛刊受到普遍欢迎 [J]. 国外文学, 1981 (1): 52.
- [11] 姚一鸣. 叶圣陶和开明图书广告 [J]. 民主, 2014 (7): 43-45.
- [12] 欧阳文彬. 读叶氏父子的图书广告 [J]. 编辑学刊, 1987 (4): 66-68.
- [13] 邱雪松. 一切为了青年: 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J]. 出版发行研究, 2013 (11): 96-98.
- [14] 谭日红. 开明书店与新文学的发展 [J].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3 (1): 37-39.
- [15] 张静, 张卓倩. 出版人章锡琛的妇女解放思想初探 [J]. 文化学刊, 2009 (6): 166-170.
- [16] 王建辉. 开明创始人章锡琛 [J]. 出版广角, 1999 (3): 10-11.
- [17] 霜木. 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 [J]. 今日浙江, 2003 (16): 45.
- [18] 章士宋. 章锡琛和开明书店 [J]. 出版史料, 2007 (2): 19-24.
- [19] 叶瑜荪. 丰子恺与开明书店 [J]. 出版史料, 2008 (4): 83-87.
- [20] 赵普光, 牛亚南. 斯文的回响——苏州叶氏家族文化评传 [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
- [21] 陈星, 陈净野, 盛秧. 从“湖畔”到“江湾”——立达学园、开明书店与白马湖作家群的关系 [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7, 24 (2): 8-12.
- [22] 张堂铸. 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 [M]. 台北: (台湾) 东大图书公司, 1999.

【下转第 116 页】

The Transmutation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ly of Jiangnan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Yingxue, Tao Xiaoju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ly in ancient China has its epochal characters. The scholarly class, with high cultivation and aesthetics,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tandards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ly.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previous literati culture of refinement, and they formed a set of aesthetics practices in life. As Jiangnan area turned in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at that time, literati there became aesthetic authority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ly. They lead the social tide of consumption. Thus, literati refinement culture flowed into the worldly society through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the secular public desired to follow them. Jiangnan literati represented the elegance, which was one of the sources of superiority and respected by other social classes. Therefore, literati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stinguish refinement from vulgarl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own elite attributes. With increasing extravagant and arrogant activiti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Jiangnan literati specially valued the tasting ability and strengthened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ti, so they could firmly control standards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ly.

Key words: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notion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ly; literati life

(收稿日期: 2017-02-15; 责任编辑: 陈鸿)

【上接第 99 页】

A Summary of the Study of “Liberal School”

Zhao Puguang, Fang Jiuyue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liberal school” mainly involves liberal naming legitimacy, carrier of literary genre, liberal collaborator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chool.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provides rich references for the later study, but places too much emphasis on its legitimacy while ignores its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as a literary school and lacks attention to its publication. Many researchers coming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cluster” to interpret “native village and city’s” legitimacy because their hometowns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areas as the original home to “liberal school”, which exposes the narrow research horizon of literary genre study. The combing and review of “liberal school”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nre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liberal school”.

Key words: literary genre; “liberal school”; legitimacy; literary publishing; enlightened collaborators

(收稿日期: 2017-01-03; 责任编辑: 陈鸿)